

走出文革連載7

## 走出文革

## 兩架發動機

(接上一期)

在書讀的越多越愚蠢的年代，她的夢想自然很快便破滅了。她學的專業和陀螺力學有關，但被分到安徽阜陽一個卷烟廠當了卷烟女工。

這陀螺會轉，烟也得轉着卷，你能說她專業不對口嗎？

但那真是一個命運的大轉折，她覺得自己就像陀螺一樣被完全轉暈了。在這小城裏，愛情的挫折更使她感受到母親的紅顏薄命。好在中國社會也同那高速旋轉的陀螺一樣，終於轉到了新的一頁，讀研究生，出國留學，讓她重拾起遺忘在圖書館裏的書本。

秋天的清華園是美麗和迷人的。那本是北京最好的季節，晚風習

習，燈光樹影中，我常常獨自在校園中沉思，但1963年的秋天是那樣短暫。

深秋時節，作為黨史教育中的一課，全班同學隨政治輔導員朱育和老師盤腿坐在圓明園遺址的廢墟前。

今天，那遺址已被鎖在深閨，四周是亭臺樓閣，茂林修竹，成了景點，接受愛國主義教育也需要掏腰包了。但買了票進去，有的祇是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感覺，少了英法聯軍劫掠焚毀的歷史感，那幾塊斷石也失去了當年的蒼涼感。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曹禺的第一部劇作《雷雨》寫于清華圖書館，我人生中的“雷雨”發軔于圓明園的殘垣斷壁。

隔靴搔癢式的思想工作開始觸及靈魂。

世紀之交，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法國歷史學家伯納·布立賽，面對那些直立着的、橫躺着的、仰臥着的、斜依着的斷壁殘垣，深感羞愧，寫下了三十多萬字的《1860：圓明園大劫難》，有揭露，也有懺悔。

一個外國人尚且如此，我們這些中國人面對這片廢墟時當然個個義憤填膺。我們不僅控訴帝國主義的暴行，而且將中國的地主資本家一起放到了歷史的審判臺。

國仇家恨，憶苦思甜，從來都是激發力量的重要源泉。

許多同學出身貧寒，自然有苦可憶，我也聲淚俱下地講述了母親悲慘的童年和她遭受工頭和日軍欺凌的故事。

就我而言，那次憶苦既是觸景生情，也是對母親所受苦難的真情表

露。

我的發言一定生動感人，不僅聽者凝神，事後不久，校刊《新清華》便來約稿。我入學三個月後，以我母親童工生涯為主題的文章《話苦甜，決心要接革命班》刊登在《新清華》上。

文章是由徐葆耕老師將我事後追記的發言稿改定的。改稿時，朱育和老師帶我去見了他，並告訴我徐老師是政治教研組的才子。那時候他還年輕，我印象中他的話並不多，三言兩語，圓臉，微胖。而我當時覺得才子都應當是瘦瘦的，如魯迅，如郭沫若，所以有點奇怪他怎麼會是才子。他後來的文字，我還是在他去世前後才看到的，確實非常有才氣和深度。難怪他後來做了清華人文學院副院長和中文系主任，受到那麼多人的贊揚。不過，那時候他一定已很瘦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了。從此，我進入了清華黨團工作者的視野，新林院和勝因院那一片綠洲則逐漸退出了我的視野。

## 救鬼秘方

1966年6月10日對清華很多人來說是一個黑色的日子。當校黨委書記蔣南翔在高教部被“揪出”的消息傳到清華後，被毛澤東斥之為盤根錯節的清華黨委頃刻瓦解。那天，在學生宿舍附近的一條小路上，校團委副書記方惠堅流着眼淚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犯錯誤了，也連累你犯了錯誤。”

大概是擔心我在大風大浪中失足，6月1日後方惠堅和我幾乎“形影不離”。他儒雅可親，是我十分信賴的老師。在他的指導下，我貼出保衛清華黨委的大字報，受到了校黨委副書記艾知生的大會表揚，說我的大字報“很有說服力”。

現在，這一切都已成為我的罪狀。

年僅21歲，毫無政治鬥爭經

驗的我無法猜測犯錯誤後會面臨何種命運，但知道我很快會失去自由。我匆匆趕回家中看望了父母，然後獨自一人來到北京圖書館，在石凳上默默地躺了幾個小時。

數年前我曾在這裏做過很多奮鬥的夢，而如今頭腦中祇有一片空白。

當我回到學校時，中共北京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組已進駐清華，美麗的清華園被革命的烈火燃燒得沸騰起來了。一夜間，各級黨政幹部、學術權威，乃至部分學生和教師都仿佛去陰曹地府領了封賞，一個個都頭頂紙糊的高帽子，成了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我這個聞名全校的高材生，校黨委的“紅人”，也被冊封為“葉鬼”，成了革命群眾最好的玩物。除了批鬥，我被關押在宿舍裏供人觀賞和羞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六月下旬，工程化學系學生蒯大富等人將

鬥爭的矛頭指向了立腳未穩的工作組。在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親自支持下，工作組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蒯”高潮，將蒯大富和一部分反對工作組的學生打成反革命。於是，清華園中又冒出了許多新鬼。

一個多月後，這件事成為毛澤東整肅劉少奇的口實，工作組壓制學生的做法被毛斥之為“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

7月28日，工作組撤出清華，清華園從此天下大亂。

如同我兩年後在清華百日大武鬥中客串了一出日後傳為佳話的“救美”插曲一樣，我在聲勢浩大的清華反蒯高潮中也客串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救鬼”鬧劇。

我稱之為客串，是因為這武鬥和反蒯本來都和我毫不相幹，但我偏要軋一脚，結果鬧出很大的動

靜，還連累我的先後兩位女友陪我一同受苦。

六月底的一天，我被兩個學生押送到大字報區接受反蒯教育，並被要求寫出大字報表明我對反蒯一事的立場。

我并未意識到革命群眾采用的是引蛇出洞的策略。在被關押了兩個多星期後，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出來走一走。於是，我津津有味地欣賞起琳琅滿目的大字報來。

在成千上萬張大字報中，給我留下印象的祇有兩張。

一張是蒯大富本人的大字報，面對工作組泰山壓頂式的壓力，他居然聲稱高壓政策的“效果等于零”，讓我不免對他的勇氣暗暗欽佩。

另一張《真三家店菜單》是反蒯的。它將大字報中的一些批判蒯大富的詞匯巧妙地編排成一份菜單，讀來令人莞爾。

文革期間，革命群眾創造了十分豐富的對敵鬥爭詞匯。有形容其凶惡的，如狼心狗肺、血口噴人；有形容其狡猾的，如混水摸魚、見風使舵；也有形容其不老實交待問題或頑固不化的，如鷄毛蒜皮、吞吞吐吐和花崗岩腦袋等。

《真三家店菜單》就是將其中和食物相關的詞匯列入菜單。狼心狗肺、混水摸魚和鷄毛蒜皮等都成了“真三家店”的招牌菜。但有些詞匯，如煽風點火、見風使舵等和食物無關，因而無法列入菜單。三家店的名稱來源于文革初期受到猛烈批判的《三家村札記》，其用意大概是將蒯大富和鄧拓等黑幫人物拉扯在一起。

我當然無法在短短的一個多小時中弄請工作組和蒯大富之間誰是誰非，但這表態支持工作組的要求却是強制性的，我必須寫點什麼才能過關。(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7

## 南京·東京(六)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接上一期)

而現在劉洪友最缺的就是錢了。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他又想到了自己的看家本領——書法。

筆墨紙硯都是現成的，還寫張繼的那首《楓橋夜泊》，還寫隸書，劉洪友一口氣寫了七八張。他想：“一張如果賣到將近1萬日元，這七八張怎麼也能賣到5萬日元。”

到哪兒去賣呢？上野公園。這是東京最大的公園，園內有多處名勝古迹，並建有博物館、國立西洋美術館、東京都

美術館及上野動物園等，人流量很大。

劉洪友帶著書法作品來到了公園。園中的老樹、高臺、鮮艷的紙燈籠、清澈的噴水池，襯托着古老的廟堂、漆黑色調的館捨，古今建築恰到好處地融合，形成了獨特的日本風格。而劉洪友無意欣賞這裏的一切，他的目的祇有一個：“就是想辦法把手裏的書法作品賣出去。”

12月的東京正值寒冷的冬季，風很大，天很冷。幾張書法作品上壓着石塊，還是被風鼓動着發出聲響，仿佛在痛苦的哀號。瘦弱的劉洪友豎起衣領，縮着脖子，站在路

邊盯着來往的人群，希望有人來買他的書法。

一個上午過去了，竟然沒有人駐足。來來往往的人幾乎無視他的存在，這對於一個抱有書法夢想，尤其在中國靠它掙過“大錢”的劉洪友來說，恰似當頭一棒的無情打擊。

是收攤還是繼續？劉洪友有些泄氣，他想起了老師曾告訴他挖井的道理：有人挖了99米，認為挖不到水，其實再堅持挖一鍬就成功了，而這時他却選擇了放棄。劉洪友選擇堅持“再挖最後一鍬”，再等等。

午飯沒有吃，肚子餓得咕咕

叫。劉洪友的目光掃向過往的行人，希望有人能與他對視，能停下來問個價也好。但是沒有，一個也沒有，直到天黑。

饑寒交迫，劉洪友幾近崩潰。他感到很失落。為什麼同樣的書法，在中國能賣上好價錢，日本人搶着買，而在日本却無人問津呢？巨大的落差，以至于他不能接受這個現實。他的自尊心遭到嚴重打擊，胃開始隱隱作痛。夜裏，他躺在床上，裹在被子裏，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溫暖的家，想起和善的親人，想着想着泪水浸濕了枕頭。

這樣的挫折對於劉洪友來說，僅僅是剛開始。

## 南京·東京(七)

磨難才識愁滋味

——不稱職的“店小二”

男兒有淚不輕彈，祇是未到傷心處。第二天早晨，劉洪友重新振作精神，因為他還有希望。那36封寄出去的信，應該能給他帶來好消息，或許有的回信已經在郵寄的路上。希望畢竟還不是現實，現實就是現在要掙到錢，讓自己能吃飽肚子，有力氣等待希望。

當時，中國人在國外留學，說是上學，其實都靠打工謀生，幾乎沒有沒打過工的。初來日本，語言不過關，最簡單的工作莫過於在餐館裏洗碗、刷盤子，劉洪友也想去碰碰運氣。

池袋是東京著名的商業區和交通樞紐，這裏有幾十條綫路，每天車站裏人來人往，熙熙攘攘，人流量非常大。人多的地方自然集聚了不少餐館。劉洪友在池袋店鋪林立的商業街裏仔細尋找着，果

然在一家料理店門口看到了寫有“招募”兩個字的廣告，因為基本上是漢字，劉洪友連蒙帶猜看懂了這家店招聘信息的主要部分，條件是每小時700日元，工作時間為下午五點到晚上十一點。老板是日本人，當然沒辦法用語言溝通，祇能連說帶比畫地交流。通過肢體語言，劉洪友明白了：他們這裏缺少一個打雜的，給廚師長打下手，洗菜、切菜，洗碗、刷盤，點菜、傳菜。

廚師長燙着當時流行的“爆炸頭”，頭發亂蓬蓬的，讓人聯想到鳥都能在上面做個窩。興許他把做菜當成一門藝果這樣去想，這造型倒像個藝術家，倒也沒什麼不妥。劉洪友打量着這位工作伙伴，不知道今後會跟他相處得怎麼樣。打雜的活並沒有多少技術含量，兩人最大的障礙是語言不通。通過打手勢和簡單的日語單詞，劉洪友勉強能明白廚師長讓他做什麼。

幹了幾個小時的活，劉洪友終

于可以享用一份免費的工作晚餐。這頓飯是他出國後用勞動換來的第一餐，再加上來日本後經濟拮据，為了省錢飯都沒好好吃過，所以吃起來格外香。至今劉洪友還記得那香噴噴的大米飯的味道，菜也豐盛，有魚，有油燜大蝦……

這頓像樣的晚餐給劉洪友增添了力量和信心，他想把這份工打好。於是，當晚劉洪友把菜單帶回宿舍，從十二點背到凌晨三四點，終於把近百個菜名記了下來。第二天上班，劉洪友的能力便展現出來了。頭天晚上還什麼不會的他，今天一上班就能用日語把菜單報出來，這讓老板和廚師長對他刮目相看，覺得這中國小伙還行。劉洪友穿梭於客人與廚師長之間，點菜、傳菜雖然忙得不亦樂乎，可一點差錯都沒出。

第三天上班，店裏來的客人特別多，出餐的節奏也跟着加快。後廚裏，“爆炸頭”廚師很投入地翻動

着炒鍋油勺，爐竈上烈火跳躍，一道道菜不停地出鍋；店堂裏，食客來來往往，有增無減。老板不斷地催促劉洪友，“快點！快點！”一着急，忙中出亂，壞事了。前天記的單詞不牢固，張冠李戴了。人家點茄子，他給人家上成了西红柿。“爆炸頭”廚師長臉拉得老長，顯然是表達對劉洪友工作的不滿。看着廚師長的那張“長臉”，劉洪友不免心裏有些緊張，結果又出錯了一客人點烤肉，他為顧客端上一份魚。工作結束，那份還是跟往常一樣的工作餐，劉洪友却没有心思享用，強迫自己心不在焉地吃了幾口，却是食之無味。

第四天，店裏客人依然很多，劉洪友心裏着急，再次忙中出錯。昨天拉長臉的廚師長終於忍耐不住，張口衝他罵了兩個字“巴嘎”。在中國的抗日電影裏，日本人常用這兩個字罵人，大家都明白是“混蛋”的意思。以前祇是在銀幕上看到，如今是親耳聽到日本人罵，感

覺完全不同。劉洪友感覺受到了極大的侮辱，但又不能發作。他知道一旦回嘴，這份工作就丟了。中國有句老話，小不忍則亂大謀，忍一步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和日本人一般見識，劉洪友安慰自己，默默地幹着自己的活。

到第五天，店裏所有人都把劉洪友當成一名熟練工來使喚，他應接不暇，又把菜上錯了。這下，廚師長火了，衝劉洪友大聲吼着，噙裏咕嚕地說了一大堆，劉洪友能聽懂的也祇有兩個字“巴嘎”。是可忍孰不可忍，劉洪友終於按捺不住，把手中的盤子往桌上重重地一摔，用中文罵道：“你‘巴嘎’，老子不受你這個氣，不幹了。”

“‘巴嘎’在日語裏也可以翻譯為‘笨蛋’的意思，但那時，我日語聽不大懂，受中國抗日電影的影響，就認為他是罵我‘混蛋’，所以跟廚師長杠上了。”劉洪友笑着說。(未完待續)